

“一带一路”：中国软实力的 “西游”之路*

刘再起 王曼莉

摘要：进入 21 世纪后，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政治多极化的背景下，依靠军事力量、经济制裁等强制性硬实力达到外交目的的时代已经过去，软实力已成为世界各主要大国扩大自身影响力、争夺国际市场、树立国家形象的有力武器。“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倡议的新一轮区域合作战略，旨在通过互联互通建设实现区域合作共赢，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打造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民族、宗教、文化和社会结构复杂，各种冲突不断，加上大国的角逐，使得沿线国家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纠葛更为尖锐，“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面临着较大的“软阻力”。需在继承和发扬古丝绸之路和平、包容、开放文化的基础上，用文化的软力量填补地区间的鸿沟，赋予“一带一路”新的时代内涵，为沿线各国搭建一个互利共赢的广阔平台，使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舞台。

关键词：软实力；“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6-0048-05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全球经济、科技、军事竞争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国际经济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全球投资、贸易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各国的发展形势仍不容乐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世界多极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垄断的全球治理机制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捉襟见肘，为了缓解国内低迷的经济形势，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主导“重返亚太”、TPP、TIPP 等战略合作机制，试图建立起高端市场堡垒，将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观。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于 2013 年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2015 年 3 月，中国正式出台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指导下开始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秉承着“亲、诚、惠、容”的外交新理念，以“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建设为重点，意在以经济合作为主

轴、人文交流为支脉，平等、自愿、开放地共建“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使沿线各国人民共同分享发展带来的收益。“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扩大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开启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区域合作的新模式。^①世界将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与向心力，见证中国作为崛起中大国的全球责任与胸襟。

一、软实力与大国的战略抉择

（一）“软实力”的内涵与外延

“软实力”（Soft Power）一词最早由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提出。在 1990 年出版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约瑟夫首次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并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由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虽然两种力量同样重要，但是在当今信息时代，软实力的作用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不同于一国军事、经济、基本资源等硬实力，学术界对于软实力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软实力建设与发展战略”（07JZD0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的文化话语权研究”（11JD710116）的阶段性成果。

的概念并没有一致的界定。结合已有文献成果，我们认为，软实力指的是民族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及参与国际组织的程度，涵盖了一国的文化、价值观、道德规范、社会制度、外交等影响国际感召力的“软”的要素。同硬实力相比，软实力所指的是一种精神力量，两者相辅相成，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坚实盔甲，软实力是硬实力快速提升的内助推要素。

一国的软实力由几个层次构成：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主要是文学、艺术、宗教、教育、道德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产生的吸引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同化力，如美国致力于向社会主义国家大肆宣扬“普世价值观”等；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在多边外交中对国际关系及政治议题的塑造力，如欧盟将“范式力量”作为宣扬其价值观的重要手段，通过影响他国的思维模式达成自己的外交目的，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四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如新加坡迅速崛起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对后发国家颇具吸引力；五是制定国际标准和规范，掌控国际政治议程的能力。^②可见，软实力所倡导的借助一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向心力感染他国，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不谋而合，即为谋求影响力而诉诸情（吸引力）与理（说服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目的。

（二）世界各大国重视对软实力的运用

进入 21 世纪后，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政治多极化的背景下，依靠军事力量、经济制裁等强制性硬实力达到一国的外交目的的时代已经过去，软实力已悄然成为世界各主要大国扩大自身影响力、争夺国际市场、树立国家形象的有力武器。以文化、意识形态、制度等为代表的软实力，因其持久性、内生性和渗透性的特点，能够借助文艺、宣传等多种形式，间接地影响国际舆论和他国政府立场，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逐渐成为各国处理国际关系与制定外交策略时的重要选择。

在这一背景下，各大国都很重视对本国软实力战略的谋划和资源的投入，以谋求在全球体系中的有利地位。美国将软实力作为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在推动苏联东欧集团解体、“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的过程中，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一方面以其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强权政治，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输出，向全世界传播有利于美国的信息，通过不断地改变各国人们的思维习惯、情感心理及行为方式，笼络人心，使普通大众接受并认可美国文化，顺从美国的战略意志。美国通过推销其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不仅得到了发达国家的认可，在世界组成了庞大的政治军事盟友集团，而且还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分子的推崇和效仿，使得美国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已成为国际主流世界观。^③此外，美国还借助宗教力量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对外与有

宗教信仰的国家建立精神纽带，这一点从历届美国总统对宗教国家的访问中多次提出“求同存异”即可看出，其依靠软实力拉拢他国的目的昭然若揭。美国如此，作为世界重要一极的欧盟在冷战结束后也越来越重视软实力，近来不断打造“民主共同体”和“价值观同盟”，加大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影响和政治理念输出，推动多边主义，使用和平的手段吸引、劝说和引导其他国家接受欧盟的对外政策目标，意在使欧盟的政治理念成为全球核心价值观，维持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以推行其外交政策理念，以便在全球体系中获得更多利益。韩国作为东亚的主要国家，在打造自身的软实力方面也不遗余力。自韩国提出“文化强国”的战略以来，“韩流”很快风靡东亚甚至全球。走向国际的韩国文化不仅为韩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助推了韩国经济的腾飞，更为韩国树立了较好的国际形象，韩国文化、经济模式、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也越来越多地被他国认可和模仿。与中国同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常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也特别注重文化外交，并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采取灵活的方式：凭借所谓与西方国家相同的制度，印度借助文化产品不断在世界各国展示其新“民主大国”的形象；在非洲，通过提供各种国际援助，并借重技术支援等形式，扩大国际影响力；在亚洲，以宗教为精神纽带，采用民间推广方式，在弘扬印度传统文化的同时增进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为其全球战略的实施作铺垫。

由此，我们认为当前大国软实力竞争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争思想权威，将本国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扩展为全球主流价值观，对他国的思想观念、行为选择甚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争文化同化，倾力扶植和输出本国传统文化，并借助融合了本国文化理念的教育、艺术作品、媒体等载体，在满足境外人们消费需求的同时，使之潜移默化地接受该国产品承载的文化理念；争战略信誉，凭借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等硬实力支撑，通过提供经济援助的方式，使被援助国心甘情愿地被其制定的全球治理规则和国际规范所驾驭。^④

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软阻力”

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趋势，致力于实现亚、欧、非陆海互联互通，与沿线国家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收益，将形成涵盖 22 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惠及 44 亿人口的世界性经济合作区。“一带一路”倡导的与沿线国家共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体现了新世纪中国对新型国家合作模式的战略构想，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革新全球治理体系的积极探索。

通过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加强亚、欧、非各国互利合作，让各国人民共享和谐、富裕的幸福生活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愿景。然而，这一伟大战略构想的实施需要沿线国家做出实质性的回应和配合。作为当前覆盖

面最广的区域合作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明区域，各个地区和宗教间固有的矛盾是不可忽视的风险。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问题是沿线国家的种族、宗教不同引起的利益冲突，导致政治互信不足^⑤，加上大国在沿线地区的利益角逐，使得形势更为复杂。虽然“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是经济合作，但沿线国家特别是中亚、西亚和中东地区，各国间不同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导致的冲突尚无结束之迹。因此，认识“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软阻力”，运用中华民族文明中特有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价值观和文化理念化解各种“软阻力”，是“一带一路”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

（一）表面热忱表态，实际踟躇不前

纵观当今世界话语格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是军事、科技、经济实力的中心，更凭借其文化、制度、价值观等强大的软实力主导全球舆论，使得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崛起一直抱有偏见。一些国家虽没有公开地表示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不断有西方媒体质疑“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为了输出中国过剩的产能，占领其他国家的资源。美国和日本的媒体更是扬言，“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确保中国能源供给安全，扩张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俄罗斯媒体甚至认为中国为“一带一路”所设立的“一行一金”是“诱饵”，认为我们的根本目的不是为沿线国家建设进行融资，而是借机推行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些变相的“中国威胁论”容易误导沿线国家舆论，增加我们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难度。

受此影响，一些沿线国家虽然口头上对“一带一路”战略热忱表态，行动上却踟躇不前，不肯进行实质性的参与和配合。西方媒体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政策的大量负面报道，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与我国的合作中心有疑虑，部分东盟国家、中亚国家和非洲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有不同程度的担忧，印度等国政府甚至不愿意对“一带一路”倡议公开表态。然而，一些国家又希望从“一带一路”建设中获得本国经济发展急缺的资金和技术，意识到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能够帮助本国经济走出阴影，不愿错过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复杂心理，导致了“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所谓的“政易经难”。

事实上，发达国家与沿线国家的这些质疑与中国崛起后的地缘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在冷战后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中并未拥有太多的政治资源。中国的崛起打破了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资源垄断和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长时间被忽视，特别是在冷战时期，中国更是受到国际主流媒体长期的负面宣传，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缺乏民意基础。^⑥据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印度、波兰、意大利、土耳其、菲律宾、越南等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足40%。2015年零点团队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态度民调的结果也显示，仅不足一成的波兰、捷克、菲律宾等国民众认为中国在外交关系中最可信赖，甚至有58%的菲律宾民众和74%的越南民众认为中国是本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沿线国家对中国产品安全性及可信度的平均评分也在及格线以下。可见，仅靠“一带一路”战略给各国人民带来的经济利益无法化解一些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误解。

（二）文化冲突不止，政治互信不足

“一带一路”涵盖人口数十亿，文化的差异性不可低估。“一带一路”需要经过多个地缘政治破碎带，这里的一些地区和国家种族宗教多元复杂，热点问题众多，历来由于宗教和种族差别而冲突不断。^⑦因此，宗教冲突、民族矛盾和文化差异无疑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必须面对的“软阻力”。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文化冲突由来已久，民心不通。“一带一路”的沿线各国在历史上创造了形态不同、风格各异的文明。“一带一路”上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等世界主要宗教。宗教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区间冲突的重要导火索。“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在族群、文化、社会制度上都有显著差别，其重要根源便是不同宗教，甚至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千百年来积累的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同作为基督教的分支却存在很大的差异；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同什叶派的矛盾一直未有缓解；佛教中的大乘、小乘教也对佛理有着各自不同的阐释。^⑧“一带一路”的重要站点耶路撒冷，千百年来宗教冲突最为惨烈，巴以至今冲突不断。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民族主义和“东突”等宗教极端势力的泛滥，导致沿线地区矛盾升级，社会结构失衡。这些冲突看似距我们很遥远，但当“一带一路”走进这些地区的时候，可能会牵涉与激化这些地区的矛盾，使自己陷入冲突的漩涡之中。^⑨此外，“一带一路”沿线的民族语言众多，使得沿线各国人们更加缺乏沟通的桥梁。

其次，从历史和现实看，沿线一些国家政治上积怨太深，缺乏政治互信。希腊对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对希腊文明的毁灭性打击始终难以忘怀；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段的保加利亚更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火药桶，不少国家仍避而远之。不仅如此，沿线国家为应对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采取的一系列利己的政策也不利于国家间的互利合作，可能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和谐的外部环境。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沿线国家由于特殊的地理、经济地位，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凸显的作用将有所不同，有些可能会成为战略的关键节点、拥有更多的机遇而使另一些国家感到机会不均等，甚至参与到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博弈之中。

（三）大国暗中掣肘，曲解和平本意

“一带一路”作为当今世界合作范围最广的区域合作战略，覆盖了亚、欧、非的主要国家，这些国家在制度、

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各国发展又深受发达国家的影 响,导致区域形势颇为复杂。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全球地位举足轻重,但面对沿线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及大国利益干涉,也必须认真协调各方利益,以较低的成本团结所有沿线国家共同实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历来是世界大国的角力区域,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一带一路”途经的部分国家和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世界主要大国或多或少地会觊觎这些资源。如,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表面上看是为了体面地退军阿富汗,实际上是意图以阿富汗为枢纽,连接经济活跃的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实现“能源南下”的战略目的。欧盟自中亚五国独立伊始就开始将目光锁定这个“邻居的邻居”,不仅是出于地缘安全因素考量,而且也缘于中亚地区丰富的油气能源储备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为了避免疑虑与冲突,欧盟还在 2007 年出台了《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其中对人权、环境、水资源等领域均有涉及。可见,世界大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利益攸关,一旦触及到大国利益,其搅局能力不可忽视。

其次,“一带一路”的部分沿线国家容易受大国利益攸关方的影响而对“一带一路”战略充满疑虑。虽然随着中国的崛起,沿线各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有所加深,但是 一些更为复杂的、非经济因素的考量使得个别大国对沿线国家比我们有着更强的影响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得 不面临社会制度、外交理念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困扰。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原已动工建设的中缅铁路被突然叫停,斯里兰卡政府也对中斯科伦坡港口城项目表态矛盾,最终中断建设,这些均源自大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博弈。可以预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类似的阻力还会更多、更复杂。“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不仅需要沿线国家的积极合作,也需要协调好世界主要大国在经济、社会、人文合作上的博弈,还原古丝绸之路和平、包容发展的本质。

三、中国软实力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实现路径

拥有五千年璀璨历史的中华文明,是封建时代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悠久文明,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古代中国与欧、亚、非各国之间最重要的贸易通道,古丝绸之路以和平的方式存在了上千年,体现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需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借助古丝绸之路积累的与沿线国家的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用文化软实力填补地区间的文化鸿沟,赋予“一带一路”新的时代内涵,为沿线各国合作搭建一个互利共赢的大平台,让中华文化以其独特魅力走向世界舞台。

(一) 实行公共外交,打造世界理想

纵观世界主要大国的国际合作战略,唯有被其他国家心甘情愿地追随,方可顺利实施。“一带一路”沿线的多元文化和地缘冲突已是不争的事实,不少国家对倡议仍持观望态度,因此,要取得“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共识和实质性的参与,特别是在西方霸权语境下的舆论不断质疑“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更需要通过公共外交动员公众参与国际交流^①,宣传丝绸之路的和平复兴,共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共同体。

国际舆论左右着当事国的国家形象,成为其国家形象的晴雨表。只要有宏观层面的统筹安排,“一带一路”的公共外交就会潜移默化地引导国际舆论,展现出政府外交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我们可借助主流媒体和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面向沿线国家各个阶层,从经济、教育、人文等多个方面宣传中国价值观,完成官方与官方、官方与民间的信息对接,形成对中国有利的国际舆论。唯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华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有了客观的了解,才能够避免对“一带一路”战略本质的曲解,塑造可为不同利益方普遍接受的文化价值理念,打造民心相通的牢固基础。具体说来,可以采用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专门网站,做好古丝绸之路的历史宣传,建立领导人与沿线国家精英阶层的直接对话机制等方式开展公共外交。总之,公共外交可以更好地宣传“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基本立场,提升中国在周边国家的信誉,鼓励各国共享“一带一路”带来的历史机遇,塑造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理想,承担我们应负的大国责任。

(二) 动员民间力量,夯实民意基础

软实力”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曾指出,国家缺少的是关注,而关注取决于可信度,但是政府宣传很少是可信的,如美国的许多国家软实力产生自民间而非政府。^②习近平在阐述“一带一路”理念的时候,也特别强调“民心相通”在“五通”中的重要性。“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政府行为,更是惠及沿线各国民众的合作倡议,其内生性地持续开展离不开沿线国家牢固的民意基础。“民心相通”有助于沿线各国民众清楚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与“一带一路”战略的目标,更加主动地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之中。^③

第一,调动民间积极性,消解沿线国家民众的抵触情绪。“一带一路”战略勾勒了区域发展利益共享的宏伟远景,然而,一方面,沿线各国政府所能提供的资金毕竟是有限的,仅靠政府资金难免力不从心;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体现了国家意志,但如果该倡议的实施完全变成沿线国家的上层行为,势必会增加沿线各国民众的疑虑,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带来无形的阻力。实际上,“民心相通”的难度可能远远超过基础设施建设等有形的障碍。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起步阶段,政府的第一作用无可厚非,但“一带一路”内生的活力,却是来自于民间力量的主动参与。民间力量由于其政治色彩弱化,可树立牢固的社会基础,降低沿线民众的抵触情

绪，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使得“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成果不会因为沿线国家政权的更迭或者政府的消极政策而轻易改变。

第二，丰富民间文化交流形式，搭建各国人文交流的桥梁。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众的友好往来更加密切，通过文化交流、学术研讨、日常互动、文物展览等形式，各国人民不断增进对中华文明的了解，更加尊重中国和平崛起的美好意愿。“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还需要丰富民间文化交流形式，搭建各国人文交流的桥梁。如，在沿线各国设立中国文化中心并组建网络，同工商界、文化界等精英阶层以及其他各阶层开展平等的对话，使之成为传播中华文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桥头堡；设立中国文化基金，在沿线各国有组织地开展主题活动，激发民众对中华文明的兴趣；政府需要引入民间资金打造更多的文化交流项目，并为民间投资提供稳定的预期；加快建立地区性的多边文化合作机制，定期在沿线国家之间开展不同形式和规模的合作交流。此外，还需要加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共同寻求古丝绸之路积累的人文内涵。民间文化交流有助于弥补各国由于宗教、文化、风俗等造成的意识形态鸿沟，寻求共鸣，扩大信任，构建中国在沿线国家社会民众中的友好形象。

（三）掌握文化话语权，推动利益共享

过去30多年来，中国以包容、开放的姿态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并将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为人类社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正是在向处于经济困境中的世界介绍中国经验，提供中国式解决方案，这是作为发展中国家龙头的中国应该承担的责任。“一带一路”战略希望通过互联互通建设，推动公共平台和公共品建设，欢迎沿线各国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走向共同繁荣的和平通途。为了避免这种美好的远景成为中国的一厢情愿，需要靠中国文化的力量消除沿线各国的文化鸿沟，达到对共享理念的认同。

古丝绸之路蕴含的文化底蕴是“一带一路”的立足之本，“一带一路”战略是对古丝绸之路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并将在与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中得到世界的认可。“一带一路”战略又是中华文化的复兴之路——在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使之在同亚、欧、非文明的交融中得到创新提升，成为被世界各国推崇的主流文化，打造中国文化话语权的牢固根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全球视角规划沿线国家的发展前景，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增强相互信任，让各国人民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国家意志和价值观，增进世界各国对我国经济、文化基础和价值观的认同，重塑我国文化话语权的国际地位。

结束语

作为著名的世界文明古国，古代中国凭借优秀的文化

和思想为世界文明的传承、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古丝绸之路在没有任何军事干涉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维持了上千年，是古代中国同亚、欧、非各国往来最重要的贸易桥梁，是中华文明同世界文明交融的催化剂，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和人文基础，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向心力和影响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秉承丝绸之路开放、包容、互惠的理念，致力于让自身的发展成果惠及沿线各国人民，将推动新一轮更加公平的全球化。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在继承古丝绸之路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思想融入当今的区域合作体系，成为宣传中国国家意志和价值观的平台。然而，沿线国家复杂、多元的地缘政治、宗教、文化矛盾使得战略的顺利实施面临更多“软”的风险。因此，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向沿途国家还原古丝绸之路蕴含的和平发展的本质，将延续千年的平等、友好的商贸交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积极传播中华文明传统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才能解构“一带一路”沿途的文化障碍，调动沿线国家和民众的积极性，构筑坚实的民意基础，确保“西游”中的“一带一路”更为持久、内生地实施，共同打造世界梦想。

注释：

- ①⑤ 田慧敏、曹红辉：《“一带一路”的动因与挑战》，《全球化》2015年第6期。
- ② 于溪滨：《软实力理论的内涵、产生背景及运用》，《当代世界》2006年第9期。
- ③ 陆钢：《美国文化软实力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 ④ 刘再起、徐艳飞：《软实力是影响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江汉论坛》2012年第3期。
- ⑥ 李晓、李俊久：《“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
- ⑦ 周方银：《“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挑战及其应对》，《国际观察》2015年第4期。
- ⑧ 尹亚利：《建设“一带一路”亟须文化汇通》，《中国文化报》2015年7月16日。
- ⑨ 周平：《“一带一路”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及其管控》，《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期。
- ⑩ 赵启正：《“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先行》，《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 ⑪ 刘昌明、孙云飞：《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反响与应对策略》，《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 ⑫ 陈俊杰：《“一带一路”战略刍议》，《经济论坛》2015年第6期。

作者简介：刘再起，男，1967年生，湖南衡阳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俄罗斯乌克兰研究所所长，湖北武汉，430072；王曼莉，女，1988年生，安徽宿州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龙伏）